

◎ 席宣 金春明 著

『文化大革命』

简史

增订
新版

中共党史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简史

〔增订新版〕

席 宣 金春明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 金春明 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7
ISBN 7-80023-960-8

I. 文… II. ①席… ②金 III.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 IV. D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2117 号

书 名: “文化大革命”简史 (增订新版)

作 者: 席 宣 金春明

责任编辑: 朱中文 陈海平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12.5

印 数: 124001-130000 册

版 次: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6 次印刷

ISBN 7-80023-960-8/K · 880

定 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 (010)82517246, 82517244

增订新版前言

这本8年前出版的书,正版已加印多次,至今仍时有脱销。出版社拟再版出书,我们借机对全书作了比较细致的修订,并按一些读者的建议,增编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以便查阅。对书中某些史实、判断和表述等方面的不妥之处,我们参考这8年来一些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和评论文章,作了修改补充,在此深表谢意。对这个增订本,尚望继续得到读者的指正。

作 者

2004年12月

引 言

那场在神州大地上摧梁折柱的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名的政治大风暴，已经过去20年了。但史无前例的大内乱留下的创伤至深且钜，久久难以愈合，时而隐隐作痛。它提醒和促使人们去思考和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的条件下，为什么会发生“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为什么会几经曲折而延续长达10年之久？它给我们留下哪些必须牢牢记取的经验教训？如此等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指导思想、概要过程和主要责任，以及主要经验教训等，作了扼要而明确的回答，是研究这10年历史的重要的指导性文件。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化大革命”史，需要在《历史决议》的指导下，对很多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实际情况，有待于继续发掘和澄清。特别是探寻纷繁复杂的各种人物和事件背后的历史动因和内在联系以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则更有待于继续努力。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当然也只有在各方面协作努力的前提下才可能完成。不过首当其冲的是史学工作者，特别是中共党史的专业工作者。

我们二人都是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几十年的专业工作者。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工作，也近20年了。由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特殊复杂性和曲折性，至今对一些问题还不能说都分析清楚了。但是，我们认为，对“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确实已经到了应该给予系统的阐述、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的时候了。而“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现状同广大群众要求了解历史、认真汲取经验教训的迫切需要，确实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重大历史事件的透彻剖析和研究总结，常常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但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责任绝不应只留给后人。我们这一代“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这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使我们鼓起勇气写出这本《“文化大革命”简史》，把自己的研究所得作为一家之言贡献给读者。希望它能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同时，通过探讨和交流，也使我们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得到推动。限于我们的研究水平和条件，书中可能会有些不妥之处，欢迎提出批评和指正。

1995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增订新版前言	1
引 言	2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与起因	1
一、“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	3
二、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	20
三、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	34
四、在三个交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中走向极端	49
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62
一、一条奇异的导火线	63
二、全面发动的纲领和领导机构	76
三、“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资反路线”	93
第三章 以全面夺权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高潮	112
一、“上海一月风暴” 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	113
二、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	124
三、在“抓叛徒”声中刘少奇冤案铸成	139

四、“全国山河一片红”和缺员甚多的中共中央全会	160
第四章 稳定“文化大革命”格局的努力和林彪事件	175
一、“造反派”胜利的中共九大	176
二、“斗、批、改”引发新混乱	184
三、庐山上的风云突变	198
四、林彪集团的覆灭	208
第五章 “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	215
一、“批林整风”和周恩来纠“左”的努力	216
二、继续九大错误的中共十大	228
三、借题发挥的“批林批孔”	233
第六章 整顿与反整顿的较量 “文化大革命”结束	246
一、邓小平主持工作与全面整顿	247
二、整顿中的较量和曲折	261
三、突如其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273
四、悼念周恩来 天安门事件爆发	282
五、毛泽东逝世 粉碎“四人帮”	290
第七章 十年浩劫后的思考	300
一、十年大内乱的严重恶果	300

二、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314
三、永不能忘的教训	324
四、历史的补偿	336
附录 “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341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与起因

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像突然袭来的飓风，短时间就席卷中国大地，把中国人民带进一场长达10年多的浩劫之中。这场灾难临头时，人们普遍不知它从何而起。且不说普通老百姓，就连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是普遍表现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人们只能从最高指示、中央文件、首长讲话中去“领会精神”，从街头巷尾的小道消息中去“猜测动向”。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使“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带有混乱而朦胧的色彩，人们难以窥其究竟。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同时，党内外人士、中外学者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大量评述，对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索，更成为研究的热点。人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等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次，去寻找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这些可贵的努力，开始拨开笼罩着“文化大革命”的层层迷雾，使大家能看到一些因果联系和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但是，由于众说纷纭，头绪繁多，使人目不暇接而又不明晰确知。似乎“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一切弊端，都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紧密相关。甚至有人说：“五十年代的道路是通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认定“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然而，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别的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发现中国社会

所存在的主要弊端，如政治经济体制僵化、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崇拜等，在别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尽管表现形态和严重程度不同。而那些国家虽然也出过一些乱子，却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把那些乱子如有的同志那样称作“小文革”或是“文革的派生形态”呢？显然不能。事实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执政党的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并号召全民参加，笼罩着反修防修的神圣光环，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性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形式是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党和国家的黑暗面，全面夺权。显然，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历史学的科学价值，就在于借助翔实的史料，对具体历史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揭示出本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俾能成为借鉴。探索“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只能对当时和之前的历史过程进行具体分析，从中找出具体的、主导的原因。以“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为实例，加以推演，同“文化大革命”挂上钩，虽然也能说出一些道理，也能给人以启发和教育，但那还不能弄清“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还不能成为历史科学的解答。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作出了科学的论断。经过二十几年时间的考验，证明那些主导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深刻中肯的，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权威性文件。

“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我们认为，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

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误断开始

这里说的“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主要是指1957年以后。为什么要以1957年作为一个分界线呢？因为在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前，中国是一个阶级社会。那时党内发生的“左”倾错误，主要是把朋友错当作敌人，扩大打击面，缩小同盟军；在斗争中采取了不适当的策略和手段等。而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社会的客观状况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剥削阶级已基本上被消灭。因而党的任务也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即从主要是“打碎旧世界”，转向“建设新世界”。所以，1957年后的“左”，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认识，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等问题。这时的“左”倾理论和实践，既与过去的“左”有认识根源和历史根源等方面的联系，又有客观社会条件和理论实际内容的重大不同。弄清楚这一区别，对于搞清楚是何种“左”倾理论和实践的恶性发展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是首先需要说明的。

从客观历史进程看，195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潮的发展，也确实是从对国内阶级形势估量的不当和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误断开始的。

本来，在中国大陆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适时地作出了正确决议，提出主要矛盾转化、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决策。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

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这种表述,在文字上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一则是容易使人误解为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方面都超越了生产力,而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一种好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好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就在于它能适应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是这样,它的先进性就值得怀疑,并不是越大、越公就越先进。二则是容易使人误解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很完善了,不存在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的问题了。尽管“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达在文字上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是它们要表达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能够给人一个很明确的认识:今后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是否像“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宣传的那样,是“刘少奇背着毛主席搞出来的”,“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修正主义货色”呢?不是。事实是:刘少奇在主持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过程中,和毛泽东一起多次反复研究,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认真修改。毛泽东认为他修改得很好,并亲笔在样稿的扉页上写了题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下边又写了“刘少奇”三个字。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还称赞这个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提纲”。可见,对政治报告毛泽东是亲自参加了修改的,是赞同的。

在“八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中有关主要矛盾的文字表述,的确表示过需再斟酌。比如他认为,应该更多地从人与自然界的矛盾来概括主要矛盾的实质。在此前后,他曾多次提出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处理好各种矛盾,以便集中力量“向自然界斗争”、“向地球开仗”等意见。但是,他没有进行理论概括,这表明他还没有考虑成熟。可见,在主要矛盾转化的根本问题上,他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在审议“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草

案时提出了一种意见,指出如果单提人与自然界的矛盾,容易使人们忽视实际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同意“八大”政治报告决议的提法,虽然有些勉强。

“八大”以后,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匈牙利事件^①,西方国家趁机掀起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的又一次反共高潮。在这场大风暴面前,中国共产党是沉着的、冷静的。从总体上看,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并没有改变“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基本判断。但是,由于毛泽东从匈牙利事件中总结出的一条最基本教训是:“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以后对国内发生的矛盾和事件的分析 and 决断。

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也促使毛泽东用很大精力去探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此期间,毛泽东围绕着国内主要矛盾问题,在北京和外地发表过多次讲话。1957年3月他在天津党的干部会议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结束了。所谓基本上结束,就是不完全结束,是说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我们“八大”上面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当教授,要学会在科学机关里作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泽东在同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还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提到理论高度加以阐述。他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从上面所引用的史料可以看

^①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生20万人大游行,要求清除前领导人拉科西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并要求前部长会议主席纳吉复职。示威中发生冲击广播电台、电话局、军火库的流血事件。纳吉上台后,事态又有新的严重发展。以卡达尔为首的一批党政领导人另立工农革命政府,请求苏军出兵镇压,11月4日,苏军进入布达佩斯,平息了动乱。对于这个事件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

出,直到1957年初,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仍然是同“八大”决议一致的。

反右派斗争 的严重影响

仅仅过了两三个月,反右派斗争爆发了。这被认为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实际上,这场“阶级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反右派斗争不但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其家属遭到很大的不幸,而且迟滞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助长了“左”倾思潮的膨胀,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以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都有重大影响。

反右派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整风期间发生的。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说:为了适应由革命时期转入建设时期的新形势,为了克服党内滋长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以便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4月30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上公开发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号召动员广大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当时,全国出现了广大群众积极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的热潮。绝大多数人都是善意的。但是无可否认,在某些地方和单位确有极少数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敌视的分子,他们受到匈牙利事件后国际反共高潮的鼓舞,趁中国共产党整风之机,兴风作浪,妄图推倒党的领导地位。一部分群众在帮助党整风中,或由于缺乏社会经验,或由于思想偏激,发表了一些措词尖锐、不完全符合实际的言论,进行了请愿、游行等活动,一时间产生了混乱。对于当时的形势,毛泽东起先是估计为“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看得并不严重;

甚至还通过各种渠道和舆论宣传，鼓励大家大胆鸣放。后来，他改变了对形势的看法，认为已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了，如不反击，有些党组织可能垮台。于是就动员全党反击，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从而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局面。

这中间的变化，从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份党内指示中可以看出端倪。文件认为，在中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在事隔两年之后的1959年，在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匈牙利事件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在中国搞了几千个小匈牙利事件。不搞这一手，对社会主义是很危险的。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匈牙利事件对毛泽东判断中国情况的影响，也可以作为反右派斗争所以采取“钓鱼”、“引蛇出洞”等做法的注脚，从中还可以看出这场“阶级斗争”在多大程度上是人为的。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给党和国家带来了许多不幸的后果，其中最直接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是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量失误和对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突然改变。在反右派斗争期间，毛泽东接连写了许多篇指示、文章和社论，对阶级斗争问题都作了过分严重的判断。如为《人民日报》写的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作出了右派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判断，这就把资产阶级又看成是一个完整存在的阶级。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毛泽东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并且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

就是证明。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为以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正是以这一系列“左”的判断为基础,在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断然肯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段话是对一年前召开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根本性改变。毛泽东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结论,得到了这次中央全会的赞同,由此必然引起全党主要任务和整个政策的相应改变。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失误和决策失误。

对于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改变,在八届三中全会一次组长会议上毛泽东曾加解释。他说:“八大”文件中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是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敲锣打鼓,服服帖帖,问题没有充分暴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富裕中农的思想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以及上层建筑中的问题,当时都看得很不清楚。经过这次大鸣大放,资产阶级要造反,问题就看清了。因此应该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从这段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八届三中全会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在理论上的反映。

对错误的实践进行概括,抽引出错误的理论观点,以此指导实践,再进行理论概括,使错误理论一步步升级,又据以指导实践,这种交互作用,始自反右派斗争。

派生出一系列错误

由于对主要矛盾作出错误判断,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上,必然会派生出一系列的错误判断。

首先,要确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必须肯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一个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1958年3月,毛泽